

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

——伊斯兰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伊朗民族主义*

刘 中 民

内容提要 早期伊朗民族主义是在什叶派伊斯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宗教 - 民族主义, 具有自身的特色。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 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自成一体, 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自近代以来伊朗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发端之际, 伊斯兰教什叶派就构成了影响伊朗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伊朗民族主义在发端年代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所形成的这种特殊联系, 决定了伊朗民族主义运动难以摆脱伊斯兰教的束缚与羁绊, 正是伊斯兰革命这一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得以在伊朗取得成功的历史积淀所在。

关键词 “烟草抗议” “宪政革命” 伊朗民族主义 伊斯兰教

作者简介 刘中民, 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上海 200083)。

在东方穆斯林国家, 民族主义的形态往往与伊斯兰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由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受伊斯兰教影响程度不同, 以及接受伊斯兰教教派的不同, 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就早期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而言, “伊朗民族主义就不仅有别于世俗的、分离的土耳其民族主义, 也有别于‘合成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是在什叶派伊斯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宗教 - 民族主义, 具有自身的特色”^①。在伊朗历史上, 什叶派靠宗教权威反对君主独裁统治而成了伊朗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近代, 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 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自成一体, 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与伊朗民族主义的交恶是伴随巴列维王朝剧烈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全面展开的。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巴列维王朝自诩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 一方面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 另一方面延续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 因此全面恶化了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促成 1979 年伊斯兰革命, 最终埋葬了巴列维王朝, 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因此, 梳理近代至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无疑是较全面认识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重要途径和环节, 同时也是准确解读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基础所在。

美国著名伊斯兰问题学者埃斯波西托认为, 伊朗民族主义运动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1870~1914 年) 开始形成的。^② 伊朗民族主义运动在发端年代就体现出区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特征。就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而言, 土耳其民族主义显现出了摆脱伊斯兰教的彻底世俗

* 本文系 2006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成果。

① 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39 页。

② See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0.

化趋向；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尽管深受伊斯兰教，尤其是深受阿富汗尼和阿卜杜伊斯兰改革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仍然是由阿拉伯地区各国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朝着世俗化方向前进的运动。而早期伊朗民族主义运动与此相反，它是在宗教领袖的领导下，以什叶派宗教文化为依托，朝着回归宗教传统方向前进的运动。因此，在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以前，由于伊朗的民族性深受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的影响，使得早期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本文主要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即巴列维王朝建立以前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亲缘关系进行论述，以认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刻历史根源。

什叶派与伊朗民族意识的亲缘关系

美国学者理查德·考特塔姆在《民族主义在伊朗》一书中曾指出，“伊朗为研究宗教和民族价值观互动关系（the interaction of religions and national values）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①其原因就在于，伊朗是穆斯林国家中唯一以什叶派为国教的国家。在伊朗，除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以及部分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约为伊朗总人口的 1/6）以外，都是什叶派教徒。什叶派教义认为，第十二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从世界隐遁后，由于他是社会独一无二的首脑，因此不能被人合法地取代，世俗统治者取代马赫迪只是暂时的。什叶派相信“他将在将来以马赫迪和救世主的形式复归。他最终将复活并结束腐败和专制，确立一个正义和公正的体制。”^②在伊玛目复活之前，宗教领袖负有责任和义务指导社会，担任此职责的宗教领袖穆智台希德（阿拉伯文原意为“勤奋者”，泛指伊斯兰教公认的权威学者）一旦被信徒们选中，就将享有崇高地位。伊玛目的权威具有不能为世俗权威替代的神学色彩。穆智台希德能够利用其权力指挥什叶派信徒反对国家或君主，其逻辑延伸即君主必须服从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的权威。

在伊朗，由于深受伊玛目侯赛因死于反对暴政的起义的影响，什叶派教义具有抵制暴政的一贯传统，注重以牺牲和殉教的悲剧方式伸张社会正义，并成为社会大众反对专制、腐败和暴政的手段，从而使什叶派充分具有善于反抗暴政的悲剧色彩。什叶派的这一特色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伊朗社会的发展，而且使伊朗民族主义具有区别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鲜明特色。用理查德·考特塔姆的话来说，在伊朗“什叶派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历史地增强了伊朗的特殊性，伊朗与在伊斯兰教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伊朗的独特意识”，伊朗的民族意识与什叶派的宗教意识紧密结合，使得“在 20 世纪以前没有人怀疑对伊朗国家的忠诚和对什叶派教派的忠诚是两种不同的忠诚”，“也正是由于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特殊关系使得伊朗民族主义的功能更多地表现为不规则性。”^③“当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乌里玛权力伴随政府的现代化而丧失之际，伊朗的乌里玛并没有丧失权力的相同体验。在伊朗国王纳绥尔丁（1848~1896 年）的长期统治下，伊朗有效的现代改革微乎其微，同地方割据和部族独立相伴随的是乌里玛在享受人民尊敬的同时也享受着权力。”^④这一切都决定了处在萌芽时期的早期伊朗民族主义必然与伊斯兰教有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

伊斯兰教及其什叶派乌里玛阶层在伊朗的特殊地位与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42 年）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在萨法维王朝以前，在伊朗占主导地位的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在萨法维王朝开始确立其主导地位，并成为这个伊斯兰帝国的官方宗教。萨法维人属于伊朗西北部操突厥语的一个部落，是在苏菲神秘主义教团基础上组成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群体，教团首领同

① Richard W. Cottan, *Nationalism in Ira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p. 9.

② John L. Esposito, op. cit., pp. 80-81.

③ Richard W. Cottan, op. cit., pp. 134-135.

④ Ibid.

时也是部族首领。15~16世纪交替之际,萨法维人以传播伊玛目教义为名在附近的土库曼人之间扩大了影响,最终在推翻黑羊王朝(1380~1468年)和白羊王朝(1378~1508年)后建立了萨法维王朝。^①伊朗国王伊斯玛仪为了清除逊尼派的影响,并与毗邻的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争雄,在政体上采取了政教合一原则,他宣布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并自称为第七代伊玛目的后裔,为隐遁的伊玛目的代理人,即“真主在世间的影子”,具有半神半人的崇高地位。

萨法维王朝王权与教权结合形成了伊朗特殊的政教关系,一方面以教法学家为主体的宗教学者乌里玛阶层的地位得以提高,他们被尊为隐遁的伊玛目的代理人 and 一般信徒的宗教导师,享有半官方学者的特殊地位,同时与封建王权形成了既支持又约束的特殊关系。因为“什叶派不同于逊尼派的政治思想,从来没有发展到为世俗统治者的宗教合法性提供神学和法律的支持。尽管宗教学者受国家指派,但是什叶派政治理论继续申明伊玛目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并且对国家及其统治者保持了模糊态度。世俗统治者作为公共秩序的权威,只有在伊玛目再世之前可以被接受,但是什叶派对世俗统治者的终极权威仍然是否定的”^②。另一方面,大多数宗教学者在法理和道义上否定王权合法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屈服于王权,并且随着萨法维王朝世俗化倾向的日益明显而要求抬高自身地位。与此同时,王权的加强也受到了诸多因素限制:王权远没有建立起强大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各行省仍处于半独立的封建割据状态,地方部族依然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而宗教上层则靠寺院经济的后盾和独立的军队保持与国王的距离。

因此,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的民族意识仍然非常淡薄,处在萌芽状态的民族认同和什叶派的宗教认同相混杂而没有形成鲜明分野。正如我国伊斯兰教专家吴云贵先生所言:“萨法维王朝是伊朗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期间什叶派教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文化基础。如果说当时确有一种可称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民族认同的基础既是民族共性,也是宗教共性。”^③

在萨法维王朝时期,王权与什叶派教权之间一方面相互妥协、互为依托,另一方面,彼此又构成对方的威胁。什叶派由于在历史上长期受压制,形成了严密的宗教组织,且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加之宗教领袖的威望在群众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而成为群众反对暴政,以及外来侵略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而什叶派的这一特性也恰恰深刻影响了早期伊朗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运动。进入恺加王朝后,乌里玛阶层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并且与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构成了王权的严重威胁。“什叶派乌里玛所获得的行政管理及司法方面的半自治地位对于他们追求社会领导权来说,相当有利。因为,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集团和个人一般都要求助于宗教力量;而什叶派乌里玛则可以通过平息或利用社会不满情绪向政府显示其威力,来达到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目的。”^④由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朗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什叶派的影响,并使早期伊朗民族主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什叶派与“烟草抗议”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英国和沙俄在西亚、中亚的争夺,具有丰富资源和重要地缘政治位置的伊朗已成为英国和沙俄的势力范围,两国分别控制了伊朗全境,英国势力范围在南部和中部;沙俄则控制了伊朗的北部;而其他地区则沦为两国争夺的缓冲地带。^⑤由于伊朗沦为英国和沙俄的势力范

① 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前引书,第240页。

② John L. Esposito, op. cit., p. 81.

③ 吴云贵、周燮藩著:前引书,第240页。

④ 殷浩强:《试析伊朗社会变化过程中宗教的作用》,载《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34页。

⑤ See Richard W. Cottam, op. cit., p. 13.

围，而恺加王朝又不断在英国和沙俄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在客观上促进了伊朗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实行改革、倡导新政的呼声日益高涨，且构成了伊朗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19世纪80年代，受过西方教育的伊朗封建贵族马尔库姆汗（1833~1908年），在德黑兰创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宣传君主立宪思想，试图通过议会制度对君主专制进行限制。为了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同时也是考虑到宗教知识阶层的地位，力图与宗教乌里玛阶层进行合作，但是由于事情败露，被迫转向海外，并创办了《法言报》继续抨击封建专制腐败，宣传民主改革思想，倡导在伊朗实行宪政制度。^①与此同时，带有东方穆斯林民族主义情绪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伊朗下层民众中也有广泛影响。其间，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创始人阿富汗尼曾经两次访问伊朗，并作为伊朗国王纳绥尔丁的顾问，劝说国王实行政治改革，采用宪政制度，但均遭到了伊朗国王的拒绝，阿富汗尼因而被驱逐出境而前往奥斯曼帝国。尽管如此，受其思想影响的伊朗民众则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号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欧洲的殖民统治。^②

1890年伊朗纳绥尔丁国王给予英国公司烟草销售和出口的垄断权，激起了社会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场由宗教学者和商人领导的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和游行示威活动爆发，且得到了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阿富汗尼的支持，宗教学者阿亚图拉·阿什拉兹发布了禁止吸烟的法特瓦（宗教法令），且成为这场史称“烟草抗议”（The Tobacco Protest）运动的重要领导人。^③1891年在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地举行了抗议烟草专利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国王的决定。在“烟草抗议”这场持续一年多的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中，一批颇有威望的“宗教贤哲”即穆智台希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宗教教法权威解释者的名义发布命令，号召各地教民在废除烟草协议前进行禁烟运动，所有的烟草商店纷纷响应并停止营业。迫于巨大的民众压力，纳绥尔丁国王被迫于1891年底废除了烟草专利协议，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烟草抗议”活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伊朗历史的转折点”^④。什叶派宗教学者在这场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什叶派及其宗教领袖开始崭露头角，并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宪政革命时期的伊斯兰教与伊朗民族主义

19世纪下半叶，宪政主义开始在伊朗传播，且构成了伊朗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宪政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列强入侵和王朝政治腐败无能，不少人认识到要防止西方列强侵略和实现伊朗民族复兴，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19世纪60年代，一位高级僧侣在游历欧洲后指出：“我观察到法国和英国的进步要比俄国先进一千倍……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背后是什么原因……？其诀窍只有一个词：法律”。而另外一位伊朗商人也指出：“治国有两种办法，一是伊朗的办法，即君主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二是西方的方法，即人民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前者让国家衰落，后者让国家富强。日本和伊朗一样是专制国家，但自从立宪后便迅速赶上西方。”“因此，只有当民族的意见付诸实施，民族与国家的事务才能走上正轨。”^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斯兰世界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挽救趋向衰落的伊斯兰社会。在伊朗，主张宪政改革的大多是受伊斯兰传统文化影响的人们，包括宗教领袖、集市商人、部落首领、中小地主等。1891~1892年的“烟草抗议”斗争使他们深信，只有建立一个反映民

① 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前引书，第242页。

② See Mehrdad Kia “Pan-Islamism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Ira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2 No 1, January 1996.

③ See John L. Esposito op. cit., p 82.

④ Richard W. Cottan, op. cit., p. 12.

⑤ Azar Tababi “The Role of the Clergy in Modern Iranian Politics”, in Nikki R. Keddi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3-54.

意的“开明政府”，才能真正维护伊朗民众的利益，才能取得反对欧洲列强斗争的胜利。由于持宪政主义主张的思想家们深受伊斯兰传统文化影响，在伊朗并没出现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也没有成为独立于伊斯兰教之外的意识形态，宗教领袖构成了伊朗民族主义的领导阶层，而遍布伊朗各地的清真寺则成为民众活动的重要场所。

1896年，一个阿富汗尼的追随者刺杀了伊朗国王纳绥尔丁，此后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①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秘密会社，其成员主要来自伊斯兰学者阶层和受到宗教思想影响的对现实不满者。他们用宣教传道的传统方式，用穆斯林熟悉的宗教语言表达政治抗议。许多伊玛目把恺加王朝比喻为伊斯兰历史上血腥镇压什叶派的倭马亚王朝，而把他们自己组建的秘密会社比喻为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时代的“伊斯兰革命党”，号召人们发扬殉教精神，进行反对不义的统治者的斗争。参加抗议活动的伊朗商业阶层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要求撤销外国在伊朗的海关官员，建立司法部，以保障司法平等。^②

1905年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伊朗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朗宗教学者和商业阶层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斗争，要求罢免首相，实行民主改革。宗教学者在德黑兰举行示威游行，其中有千余名宗教学者在遭到军警镇压后逃往什叶派圣城库姆避难，而一批商人聚集在英国大使馆寻求保护。1906年元月，伊朗国王穆扎法尔丁被迫实行改革，召集各界人士组成“国民协商会议”(National Consultative Assembly)以制定宪法，但迟迟不履行诺言。同年7月30日，国王在重压之下罢免首相，宣布实行宪政。同年10月，第一届国民议会在德黑兰召开，通过伊朗历史上第一部宪法。^③这就是伊朗历史上的宪政革命。此次宪政革命标志着伊朗开始向现代社会迈进，其最大成果是通过了伊朗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伊朗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议会设立上下两院，下院以选举为基础，上院则一半选举、一半由国王任命。国王拥有行政权，有任命首相和内阁大臣的权利。国王可以解散议会，但不可以不召集议会。宪法还宣布成立独立于宗教法庭之外的世俗法庭，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切都体现了现代西方的宪政精神。

但是，伊朗宪法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专制制度仍在伊朗延续。1908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阿里在俄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并废黜宪法。1909年，反对国王的力量继续打着立宪的旗帜，在英国的支持下占领德黑兰，废黜了老国王穆罕默德·阿里，另立了新国王艾哈迈德，立宪政府重新建立。1911年，逃往俄国的伊朗前国王穆罕默德·阿里企图复辟，但遭失败。不久，沙俄和英国对伊朗进行武装干涉，保皇派趁机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占领了议会大厦，强行取缔议会。伊朗宪政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伊朗重陷黑暗专制统治之下。从1905~1911年伊朗宪政革命看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僧侣阶层即宗教学者在宪政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伊朗的宪政主义有了强烈的宗教烙印。^④在宪政革命前夕，当王朝政府企图逮捕激烈批评国王的人时，正是宗教学者在清真寺正式发表要求立宪的宣言，从而引发了伊朗宪政革命。在作为宪政革命成果的宪法中规定：由高级僧侣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立法进行审查，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不得成为法律。因此，这实际上等于赋予宗教学者以宪法裁判权，他们可以随时宣布不符合自己意愿的法律无效。此外，伊斯兰教宗教界人士还把斗争的胜利视为恢复伊斯兰教法的良机，“宗教学者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是将恢复加强与《古兰经》的联系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当然包括接受“沙里亚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同时强调任何人为法律的通过都必须经乌里玛确认与“沙里亚法”保持一致，并经过解释后才能得以通过。”^⑤伊朗

① See John L. Esposito op. cit., p. 83.

② 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前引书，第244页。

③ See John L. Esposito op. cit., pp. 83-84.

④ 参见钱乘旦：《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第28页。

⑤ Richard W. Cottan, op. cit., p. 140.

宗教领袖的表白则更加露骨地反对宪政制度：“伊朗这个伊斯兰国家不可能实行宪政制度，除非废除了伊斯兰教。”^①另一位宗教领袖侯赛因·纳伊尼在1919年发表论著，尽管承认宪政主义，但是主张宪政主义须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为基础。他指出，鉴于隐遁的伊玛目尚未莅临人间，无法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限制世俗统治者的权力，以反对专制独裁。他认为“这种制度可以称之为正义的、有限的、公正的、有条件的、负责的和权威的政府”，其基础是“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履行职责”，^②建立宪政制度应该根据两个原则，即宪法和“国民协商会议”。宪法的作用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力和政府的权限；而“国民协商会议”作为议会的职责，在于监督立法、保障立法原则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侯赛因·纳伊尼的思想与当代伊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的思想非常相似，其思想渊源都是什叶派伊玛目学说。在宪政革命中，宗教学者对于宪政的立场是十分矛盾的，在希望通过立宪来限制君主权力的同时，他们又满怀对源于西方宪政制度的怀疑，并认为只有把宪政制度置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伊玛目学说的框架内才是可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宪政主义不可能采取彻底支持的立场，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制度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在伊朗确立。

第二，纯粹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开始日益与宗教传统派分化而成为独立的力量。在宪政革命中，“宗教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在立场观点上的分歧开始扩大，并表现为一种日益增长的张力。”^③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的基础是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希望伊朗实现民族复兴，希望通过学习西方，通过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府形式，实现伊朗的现代化，“他们的民族主义出自与僧侣恰恰相反的立场；后者要恢复伊朗的过去，前者要创造伊朗的未来。双方在宪政革命中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同床异梦，在后来伊朗的现代化历程中，双方关系十分微妙”^④。日益独立和世俗的伊朗民族主义的出现表明，在未来伊朗现代化进程中世俗民族主义与传统伊斯兰势力之间的矛盾将尖锐化。历史证明，在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中一直交织着这种矛盾，巴列维父子作为伊朗世俗民族主义的代表，其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尤其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完全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极度恶化了世俗民族主义政府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其激化的最终结果即霍梅尼以伊斯兰教为武器发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埋葬了推行全盘西化的巴列维王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近代以来伊朗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发端之际，伊斯兰教什叶派就构成了影响伊朗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什叶派的意识形态、象征、领导作用在这场具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双重意义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⑤，“伊朗的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主义的控制”^⑥。这也许正是伊斯兰革命这一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得以在伊朗取得成功的历史积淀所在。伊朗民族主义在发端年代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所形成的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伊朗民族主义运动难以摆脱伊斯兰教的束缚与羁绊，霍梅尼领导的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正在于此。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世俗的民族主义在伊朗还远没有形成，这也正是本文揭示伊朗近代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成红)

① Shaykh Fazl Allah Nuli “Refutation of the Idea of Constitutionalism”, translated by AbdulH airi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 3, October 1977, p. 329.

② See John L. Donohue and John L. Esposito, eds., *Islam in Transition: Muslim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89, 288.

③ John L. Esposito, op. cit., p. 84.

④ 钱乘旦：前引文，第29页。

⑤ John L. Esposito, op. cit., p. 83.

⑥ 钱乘旦：前引文，第28页。

Islam and Basic Features of Modernization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Wang Tiezheng

pp. 17– 23

The Road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s decided by its religious native feature and strong popular feature of Isla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region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precedes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odel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as diversity and manifestation; and national interference to some extent and super government power can play dominant role in pushing modernization.

the politics development is beyo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doesn't lead to essential chang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re are concentrated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are no sta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modernization. These delays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many countries. It's a lasting problem for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ft (Socialism)

Movement in Iran (Continued)

—Left Party and Islam Revolution

Wang Zezhuang

pp. 31– 37

After Islam Revolution, the Islam voice and sense dominated by Khomeini gradually occupied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religious power grasped the core of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s, such as "Mojahedin", "the Fedayeeh Organization", "the Tudeh Party" and "Freedom Movement" were marginalized from

the stage of politics. These courses evolved almost in the same time.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united battlefield of revolution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common enemies which demonstrated the "law" of so-called "nature history" stage of western "revolutionary ideas".

From the "Tobacco Protest" to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slam and Iran's Nationalism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

Liu Zhongmin

pp. 38– 43

Iran's early nationalism was a special religious-nationalism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Shia Islam culture. Iran's nationalism of anti-feudalism and colonialism was coordinated with Islam. Shia for Iran's special relative relation with Islam Shia in history. With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Iran's nationalism movement, Islam Shia grad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e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arly relation of Iran's nationalism with Islam Shia decided that it was hard for Iran nationalism to break away from influence of Islam, which was the historic reason of modern Islam movement marked by the milestone of Islam Revolution.